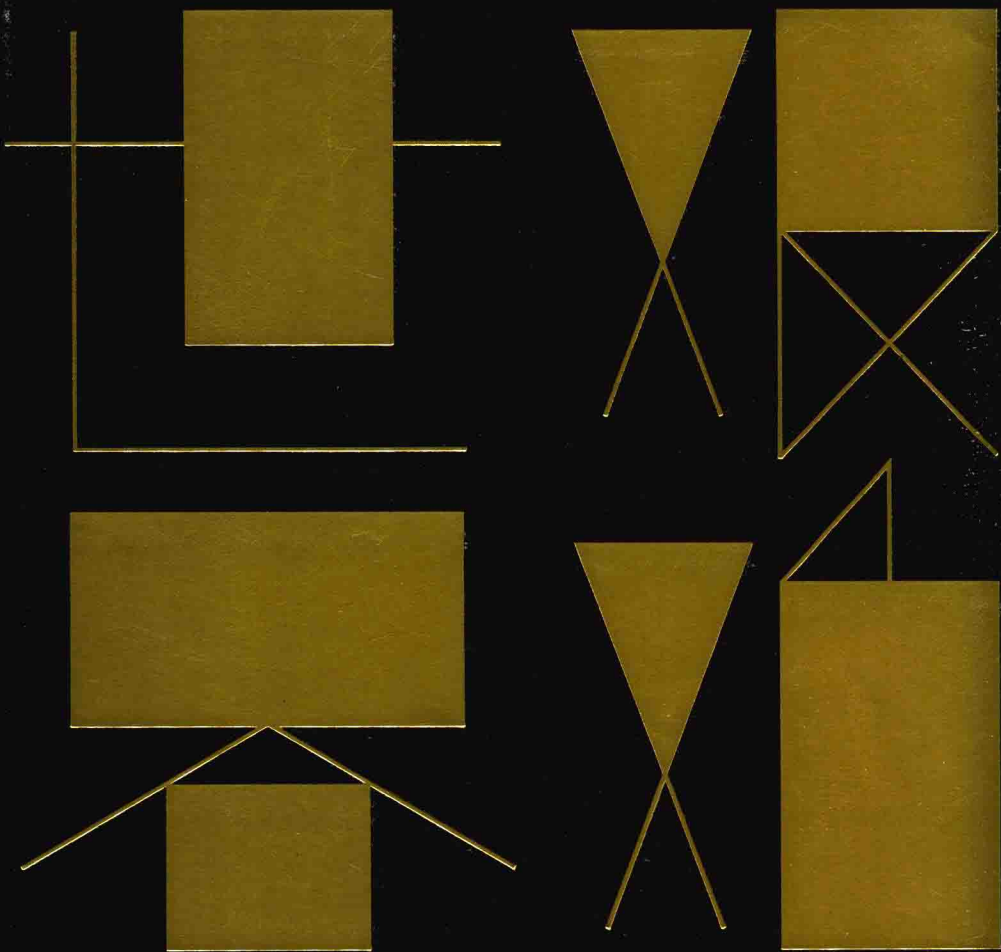




艰难世界

③ 2 3 1 5

葛一敏 乔叶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艰难世界

@

2

0

1

5

葛一敏 乔叶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艰难世界@2015 / 葛一敏, 乔叶编.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100-9

I. ①艰…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7232 号

书 名 艰难世界@2015

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赵 阳 胡 泊

责任校对 张松寿 李 媛 吕 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100-9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初 心^①

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	格 非 3
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 —————	李 颖 9
恶念丛生 —————	周晓枫 6
真实的爱情 —————	周国平 49
庶民的“契约精神” —————	孙 歌 53
回顾初心 —————	席慕蓉 60
洗手 —————	朱以撒 66
母亲的房子 —————	蔡崇达 72
走亲戚 —————	安 宁 86

大 地^②

父亲的荣与辱 —————	梁晓声 95
棉花朵朵白——一位河南女作家的新疆之行 —————	阿 慧 104
白鸟悠悠下 —————	白 琳 115
江山交付的下午 —————	林 虹 131
泥土哪去了 —————	南 帆 138
那朵野菊还在开 —————	彦 妮 148
所谓南太行和一个农民 —————	杨献平 156

还乡三记	邓安庆	164
为故乡喊魂	穆志强	174
卑微者	简 墨	183

记 忆 ③

旧年的血泪	熊育群	191
一张纸的前世今生	吴昕孺	216
服饰的活性和通达	葛水平	225
重读王维	钱红莉	231
深蓝中年	王晓莉	238
第一勺蜜糖	朱 个	243
敝车自爱记	马村长	254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毛 尖	258
一个人的音乐史	王秀云	265

观 点 ④

变革时代的文学之“难”——在中日韩三国东亚文学论坛的演讲	李敬泽	273
文学的生活,生活的文学	刘震云	279

①

心

初

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格 非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我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40分。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

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他对我笨手笨脚心中有数,而我对他的那句有名的格言记忆深刻。当时,他坐在我家唯一的一张木椅上,跷着腿,剔着牙,笑嘻嘻地对我说:“手艺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母亲已经在教我她所理解的待师之道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吃饭要快,饭后给师傅递上一条热毛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像个蜡烛——不点不亮……记住了这些口诀,我就要前去投奔师傅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改变了我日后的命运。

他姓翟,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谏壁中学任教研组长,如果我愿意去那里读补习班的话,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与这位翟老师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出色,他是如何从众多的落榜生中挑中我,并挨家挨户一路寻访,来到我们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的母亲当即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那所全县仅有的重点中学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她对于我能考上大学有任何具体的信心,而是来访者的盛情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让她感到惊慌失措。我如此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师傅日后可能的摧残,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

当我带着翟老师的亲笔信来到谏壁中学的时候，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样顺利。翟老师的那位朋友在谏壁中学并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能来谏中读书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语文、数学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60分。“否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读完了信，皱起了眉头，“把你的高考成绩单拿出来让我看看。”

“成绩单让我给弄丢了。”我回答说，其实，那张成绩单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我不能将它拿出来。

“丢了？”他反问了我一句，眼睛盯着我看，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那这样吧，你到县文教局跑一趟，他们那儿有存底，你去抄一份回来就是了。”

他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县文教局的地址。我捏着那张小纸片出了校门，来到了马路边。看上去我有两个选择：往东约15公里处，是我的老家，我只要随时拦下一辆过往的汽车就可以回到那里；假如我跳上3路公交车往西去，最终可以抵达镇江市，那是县文教局的所在地。两个选择都会指向同一个结果：我将不得不与学校作永久的告别，成为一名木匠学徒，每天给我的师傅搓上几条热乎乎的毛巾。

我在路边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选择了没有希望的希望，选择了垂死的挣扎，选择了延迟的判断，决定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来到县文教局，正赶上下班时间。传达室的老头把我拦住了，我勉强作了一番解释、央求，他只有一句话：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这倒也好，反正我也不是非进去不可。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我口袋里有一份成绩单的原件，却非要进去弄一份一模一样的抄件干什么。我正要离开那儿，一个声音从背后把我叫住了。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朝门口走来，女的梳着齐耳短发，男的夹着一只公文包。

我说我想办一份高考成绩证明。

“现在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男的说，他仍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

“我看我们还是替他办一下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女的说。那位男的犹豫了一下，就站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他们一边为我翻找档案，一边问我是哪里人，高考成绩单是怎么弄丢的，还能不能记住准考证号码，以及我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派什么用场。

“我的成绩单没有丢。”这时，我突然说了一句。

“那你还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怎么回事？”

“我想去谏中读补习班，可他们规定语文、数学必须达到及格线……”我答道。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还说了不该说的，比如母亲让我去做木匠那件事，我不愿替那位既害怕又憎恶的师傅搓热毛巾。

“这怎么行！”她朝那位同事看了一眼，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他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心事，终于，他朝我摆摆手，让我到外面去等一会儿。10分钟后，他们又把我叫了进去。10分钟，一切都决定了。

她把一张写有语文、数学成绩的证明公函递给我：“你看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说。我记得在这份公函上，语文成绩68分，数学是70分。

接下来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公章。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关上又打开，一遍又一遍。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担心他们最后一刻会改变主意。

其实，公章就在她手边，她太紧张了。我看见她将公章从旧信封里取出来，朝它呵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苟富贵，毋相忘。”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在谏壁中学，我最害怕两个人。一个是校医，另一个是教导处的罗主任。校医对我表示憎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屡屡通过让自己生病这一“锦囊妙计”去折磨他的耐心。后来，他甚至拒绝给我治疗，我只得穿过浮尘蔽日的谏壁发电厂厂区，去那儿的职工医院注射青霉素。

至于罗主任，他那军人般高大结实的身材，具有摧枯拉朽魔力的金属嗓音，饿鹰般的眼神都让我不寒而栗。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总要远远地站住，叫他一声“罗主任”，可他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有时，他已经走远了，却突然转过身来，再朝我看上两眼，莫非，他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也许他已经发现我的入学成绩是假的了？这个念头很快就缠上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几乎每晚都要梦见他有板有眼地宣读开除我的决定。

当我把心中的沉重顾虑向一位同学和盘托出时，他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你成天心事重重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混进来的吗？”我没有追问他，他也没有说出答案，不过，我总算可以暂时卸去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了。

我原来学的理科，对于历史、地理这两门新课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历史老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你这不是考试，而是背书。我让你回答孔子的教育思想，你却给我来个什么孔子字仲尼家中排行老二人称孔老二……什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不通。”他气得口吐白沫，我的那张可怜的试卷也随即被他扔到了空中。

经过他这一番调教之后，我的答题方法丝毫不见长进，期末考试时的背书功夫竟然可以精确到标点符号。他照例把我叫到办公室训话，不过他终于没有骂我，而换了一副笑脸，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记忆力倒也不得不让我佩服。”

语文课最让人开心。老师是一位乡村宿儒，据说做过陶铸的秘书。第一堂课他就使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那天讲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他读一段，讲一段。我们怀疑他在上课之前是否预先看过课文，因为他一边讲，一边满腹狐疑，最后竟至于气得破口大骂：“这算什么文章，竟然也会选入教材？不可思议……”以我们当时的眼光看来，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天山景物记》可称得上难得的美文，老师何至于如此动怒呢？选入那本教材的现代散文，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他不便妄加议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不被他批得体无完

肤。而且，他在上课时，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写作特色从来不置一词，而对于某些毫无意义的枝节却大加阐发，有一次课文中出现了“鱼翅”这个词，他突然神秘地对我们说：

“同学们，你们有谁吃过鱼翅吗？哈哈，没有吧？我呢倒是吃过那么两三回……”

开心过后，担忧跟着就来了。这种说书艺人信马由缰式的授课倒是让人“赏心悦耳”，可高考怎么办？这是每一个削尖脑袋钻入谏中的学生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这种担忧很快就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中。“不用担心，考卷总是人出的，再复杂的锁，也总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做两套模拟试题，作文不出大问题，及格总是起码吧？”他这样解释了一番，随后又绘声绘色地考证起了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准确地点。

转眼就到了1981年的夏天。6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成绩对考生本人严格保密，校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骄傲和气馁都会葬送一个学生的前途。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又碰到了罗主任。他仍然是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次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倒反而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40摄氏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

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11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着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选自译林出版社《博尔赫斯的面孔》)

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

李 颖

黑夜是穿过黄昏从地上升腾起来的。

但小时候我一直深信不疑,我认为黑夜是像一块大幕一样从天而降的。于是我的童年一直在寻找那只从天上撒下幕布的手,在黄昏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时,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发生的秘密。我假装在和他们捉迷藏,当我躲在暗处时,我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偷听昆虫的耳语,偷看暗夜来临时正在降临的飞鸟,但是小伙伴们嘈杂的脚步声总是打断了我的偷窥,黑夜如期而至,月光照亮了我童年的那垛院墙,淹没了我幼年的疑问和忧伤。

当我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沮丧地回去时,父亲总是坐在屋角织着渔网,他不出意外地脸上对我露出狡黠得意,发出嘿嘿的笑声,那是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的笑。

那时的我对这种笑容习以为常,多少年后我才奇怪地发现我其实在童年早已了然于心的秘密:父亲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和我一样的地位,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家长,那便是我的母亲。很多年后,我也发现,在他的一生中,黑夜是占有更大比重的。而属于他的黑夜,肯定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从地底升腾而起的。我的父亲,他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可疑身份,都与之关系紧密。

第一个身份:捕鱼人

他驮着自己编织的渔网出门了。

父亲驮着渔网的背影，精瘦，佝偻，不动的时候，像一根被打歪了的木桩。他驮着渔网从上堤子街走到下堤子街，一百来米，路过十几户伸手就摸得到黑色屋瓦的人家，再拐一个弯，豁然开朗的，就是码头了。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城陵矶第一码头。

那是燥热而又贫瘠的70年代，码头上的生活平静又暗流涌动。清晨，所有的中国人准时被高音喇叭激越的歌声唤醒。稍微富足点的家庭，在早上拿着汤碗和粮票，去门市部排队买回油条或豆腐脑当早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们脸上泛着满足的笑容。空气中弥漫的不是愁苦，更像是近乎夸张的幸福。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所有的意志都通过高音喇叭传到每一个人的耳膜。人间也没有隐秘可言，每一个人的早餐都在冗长的队伍里公之于众。而我们家不用排队，我们的早餐，往往是头天晚上的剩饭剩菜，和在一起用开水煮开，母亲说，这叫烫饭。我们的剩菜，是母亲趁着卖菜的小贩收拾东西回家后，捡回来的抛弃在菜市场的烂叶子。除了烫饭，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鱼。

父亲背着渔网从堤子街穿过的时候，一路对着早晨谄媚地笑。对着路边的苦楝树谄媚地笑，对着一条缓慢或飞速掠过的野狗谄媚地笑，对着虚空谄媚地笑，对着每个生活在这条街上、迎面或路过他去河里洗菜的人、洗衣的人、洗马桶的人谄媚地笑。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河流，打满补丁的机帆船停泊在不远处，妇女们把吃的穿的用的拉的全部拿到这里来洗洗刷刷。我的父亲，是这河流上唯一的男人。

谄媚地笑，是他对付贫瘠生活的唯一武器。

我家就是堤子街上十几户人家中的一户。这条看似浅显实则深奥无比的河流，它离我家不到百米之遥。涛声静谧，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恢宏背景。因此，鱼，是我们餐桌上必备的菜肴。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弄清楚，我们一直称之为河的这片水域，它是洞庭水入长江处。每年防汛期间，广播里都有一个女中音缓慢清晰地播报水文：城陵矶，多少多少点多少米，涨。或者：城陵矶，多少

多少点多少米，落。这个声音安抚了童年的我狼奔豕突无处发泄的乖戾之气，但那时的我对那些数值全无感觉，我记不住那些徘徊在20和30之间的小数，也从没有想去探究它的意义。我只是一味地等着那个藏在收音机或者喇叭里面的她播报城陵矶，无论是涨是落，对我而言，都是温柔的，都是美好的。很多年后，我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在不断地报道防汛现场时，才真正懂得，那些细微差别的数字后面，藏着一个真正的苦难的民间。

父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渔民，因为他不曾拥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他36块钱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一家五口，所以，我的幼年是在他织的密密集集的渔网中度过的。一把又一把深绿色的粗尼龙线，一根竹子做的小小梭镖，在他粗粝的手中上下翻飞。他熟谙织网的技术，他沉迷于这种静悄悄的手艺，他仿佛要织一个足够网起屋后面那条河流的大网。

而我的幼年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些平静的夜晚向一个养家男人背后袭来的深深的寒意。

他织了很久的网，也补了很久的网。那些跟渔网在一起的夜晚，父亲沉默不语，他靠着打鱼，养活了我们姐弟三个。但是除了养活，他似乎没有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一次，他把打上来的一篮鱼要我们姐弟拿到集市上去卖，兴高采烈地在后面追喊着交代：要卖5毛钱啊！我回头望着他那为了5毛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面孔，也望着周遭望着我们笑的邻居，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心酸和疼痛。我想要朝前奔跑，像是要摆脱他的疼痛的追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疼痛更像一颗石子，一直生硬地硌在我的胃里，直到我成年后的许多吃鱼的瞬间，都硌得生疼。

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鱼，也由此我总是怀疑，下辈子我们会遭报应变成一条鱼，而水，是我们来世的故乡。

但是这个故乡它喜怒无常，它传来的讯息像某种早已定好的古老的约定，注定会淹没我们的家园。可是它难道不是从一万年开始就涨的吗？那为什么会有房子建在这里呢？童年的我满怀疑惑。长大后我才明白，在那个人们

靠坐闷罐火车出远门的年代,港口水运,是一种多么繁华的景象。面水而居,在当时绝不是诗意的存在,而仅仅是靠水吃水这么现实的需要。只是在每个夏天,城陵矶的水位一直涨啊涨,涨到我们家的台阶上,涨到我们家的床脚上,渐渐地我们家的鞋子漂起来了,我们家的盆子漂起来了,母亲赶紧把地上的东西往高处搬。我们三姐弟兴奋地冲出家门,看着商铺里的人们忙着用小船运送物品,跑到街上和邻居孩子们一起戏水,捡着整条街上各种漂浮在水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匍匐在地上,也许不过是一个烟盒,也许是一只烂鞋,也许就是一张糖纸。但此刻它们漂起来了,加上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小船,整个街道就不一样了,就变成另一条幸福的欢乐的充满魔法的街道了。我们在街道上寻找着另一个隐秘的街道,寻找着夏天的蛛丝马迹,寻找着地上泛起的每一个秘密,我童年的这条街道像幻境一样,映出了我们比浑浊的水更加凉薄的现实,母亲站在家门口呵斥我们回去,因为,她早有预见性地知道,距我们家数米远的公共厕所比我们家的地势更低,我的母亲,她看见了屎、尿,以及厕纸漂浮在水面。但我们永远看不见这些,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想看见的。也许,在童年,每个人都只看得见自己想要看见的。

父亲看着我们狼狈地被母亲拖回家,他嘿嘿地笑着,这种笑跟谄媚地笑区别不大,意思似乎是向我的母亲证明,我们又挨训了,而他是很听话的。他从不管束我们,因为他自己像我们一样,也是被管束的对象。他总是这样一副表情,对着这一副烂摊子无所事事地嘿嘿地笑,对着他狼狈的家人露出高深莫测的笑意。我小时候曾经看我家的户口本,户主那一栏填着“李六梅”。李六梅是我母亲的名字。很多年后,我一直纠结于“户主”这个词,我不能确定它真正的含义,我也不能确定一个过于强势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户主”这个词对于我的一生有莫名的震慑,乃至我结婚十数年后,户口仍未迁出娘家,直到现在,原本五个人的户口本上,还剩下母亲和我二人。

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可疑的存在,作为家长的身份他是缺席的,他像一个模糊的符号,既算不上大人,也算不上孩子。他沉默的一生显得过于